

編主球鴻李

刊集界世

陸舟林著

萬代人物志

李鴻主題



陸大林著

萬人物志

辛亥年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世界當代人物志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外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陸丹
主編者 李鴻
發行人 李煜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瀛球林

版權有印准翻不所

當代人物志序

十多年來，我除了固定的工作之外，公餘好研討近百年的史事。近代人物的生平行誼，是史料構成的要素；因之，對於近代人物，不得不特別的注意了。

曾經有好幾次和研究歷史的文友相談，感到上古史、中古史等史事，多有懷疑。因為其中不盡不實的資料，實在太多了。即如近代史，時期本來和目前相距不遠，但是，實際的一一考據起來，顛倒是非的寫述，相信也不少。尋根探緒，原因非常複雜。只就近年坊間所出版的關於黨史一類的書來說，根據我們研究的結果，已經發覺其中錯誤百出了。國民黨前身的興中會成立至今，只有五十三年的歷史，身歷其事的人，現在還有不少的健在，而各方所寫述的史事，尙且有許多的錯誤，其他較早較古或較複雜的史事，他的實際性怎樣，也可以推想了。因此，我之所寫史事，立着一個原則，即「寧抱憾於遺珠，毋貽譏於亂玉。」換一句說，就是因為材料的關係，寧可寫述稍簡略，或者不能夠詳盡，但是決不肯牽引些道聽塗說甚至虛偽的故事進去，這是可以相信的。

古人說：「鑑往知來。」歷史是未來的一面鏡子。我們從各人的治學經過，生活行爲和他的詩文語

錄，多可以做對於某一個人認識的根據，利用他們實際的知識與經驗，從現實的社會事業中對照，等於一面鏡子。

這本小冊子的內容，有些是偏重某一個人的一方面而非全貌的，有些是合寫兩個人的關係，反映各個人的特性，有些是綜合各家的記述而考證他的得失異同。寫法各別，文體自然也不一律了。

其中所寫述的，十之八是作者的朋友，大家時有往來，他們的生活逸事，知道很多，寫來似更來得清楚親切。絕非用耳代目，甚至憑空渲染些事跡來聳人聽聞的所能比擬。

各篇文稿，并非成於一時，所述各人，用名用號，或者名號併用，沒有一定，而且一律沒有加以稱呼。這是因着行文之便，并無其他原因。

本書是先印行的第一冊，以後有機會的時候，準備陸續的整理原有的文稿出版，希望文友們多多的指示。

末了，書中所寫述的，倘有錯誤之處，希望讀者們指教，使得再版的時候改正，這是我所衷心的企望的。

陸丹林 卅六年八二十，上海。

當代人物志目次

康有爲與李提摩太	一
吳佩孚與楊圻	七
林語堂與周樹人	二三
詩壇耆宿陳三立	二六
標榜文治徐世昌	二九
苦學成名馬君武	三一
敢作敢爲徐謙	四一
落華生許地山	四六
老子軍創組人張一麿	五二
	五七

詩言志的葉恭綽

六二

全能畫家張大千

六七

雕刻家劉開渠

七二

開路先鋒趙祖康

七六

六不將軍陳孝威

七八

婦女運動先鋒張竹君

八三

當代人物志

康有爲與李提摩太

三水陸丹林著

康有爲們的戊戌政變，從發動而至失敗，其中關鍵，英國人基督教傳教士李提摩太實有直接的關聯。一般人的評論只以爲只是康有爲、梁啟超及康廣仁、譚嗣同、劉光第、楊深秀、楊銳、林旭等人而已（雖然尚有一部分的人同受株連），其實康等這次的動機，是受了李提摩太的言論所影響的。梁啟超敘述康有爲的生平有說：「嘗以其間道出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地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爲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等語。所謂西教會者，是指英美基督教士在上海所辦的文字佈道機構的廣學會而說。

李提摩太主持廣學會，是在一八九一年開始，除了繼續編印萬國公報等之外，譯著了許多新書，如：救世教益，泰西新史攬要，自西徂東，興學新法，中東戰紀本末，救華卮言，醒華博議，邦交提要，興華新義，理財節略，保華全書，新政策，富民策，富國真理，足民策，廣學興國策等數十種，均針對中國當時需要，而應該從速改革政治，纔能夠富國裕民，和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康梁們自號維新派，對於推行新政的結果如何，暫時不去研討他。可是他們對於外國語文，完全不懂，他們所得的世界知識，全由閱讀製造局和廣學會所譯著的圖書而來，因之他們得了新知識，著書立說（鼓吹）新政。他們的政治

思想，即維新政治，受了廣學會所譯著的影響極大。康於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在北京和李提摩太晤面，大家暢談改革中國政治。關於維新運動，李氏提供意見很多。維新派組織強學會，上海、南京、杭州、天津、武昌等地也有分會成立，李氏助之力不少。強學會所辦的「中外公報」多轉載廣學會新出版的圖書文字。強學會為着宣傳新政，搜集時論，編印「時事彙刊」，內中所收的論文，梁啟超有四十四篇，康有為有三十八篇，李提摩太有三十一篇。有一天，李氏在北京，想請一位華文書記，梁啟超竟自告奮勇去擔任。載湉（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命康將所著的書盡數呈進。康把日本明治變法考，俄大彼得變政致強考，突厥守舊削弱記，波蘭分滅記，法國革命記等當代外國史事，其中資料，多是從廣學會出版的書，擷取材料，撰述而成的。從這些事實來看，李提摩太的言論著作，對於康梁們的直接影響，也可知了。

原來廣學會所主張標示的宗旨是：譯著宗教、科學、政、及各種有益圖書，開通人民知識，改良中國社會，溝通中西感情，灌輸歐美文化。當着維新運動正在蓬勃澎湃的時期，有一次，翁同龢邀請李氏會面，請李陳述改良中國的政見。李就提出中國急需的改革有七大要端，要是能夠推行，可收維新實效：一、朝廷當聘兩位西人為顧問。二、設議政部，滿漢人員四位，另聘四位西人，熟於政治學識者為陪員。三、幣制改革，有確實金位，不濫發紙幣，免使經濟破產。四、築路開礦，舉辦實業。五、改良教育，多設各級大中學堂，彷行西法。六、擴充新聞報紙，以廣民智。聘西人輔助華人為主撰。七、整頓海軍陸軍，使收實用，可以平內亂而禦外侮。李氏這些政見，都和維新派有互相呼應的。載湉和孫家鼐讀了李著的秦西新史攬要，想着聘李出任同文館總理。

上海的開辦新式女學堂，除了教會所辦的之外，國人自己辦的要算一八九七年（光緒廿三年）經元善所創設的女學是最早的了。李氏的太太充任監學，等到後來戊戌政變，那拉氏再度垂簾聽政，上海各界聯名反對那拉氏太后的所為，是由上海電報局長經元善領銜，竟遭清會下令拿辦。經夫人便將女學託交李太太管理，避免被清廷封閉。經氏夫妻

倆即逃到澳門香港去暫避。

在政變之前的夏間，康有為數次和李商討改革清政，大家互助合作，并薦李充任清帝顧問。到了八月，保國會催促李氏晉京就職。本定在九月二十三日（陽曆）引見李氏就顧問職，怎知還沒有到期，滔天大禍突然洶湧，政變事件發生，整個局面完全改變。跟着維新派人死的死，逃的逃，革職的革職。霹靂一聲，維新政治變了守舊弄權，成了中國歷史上政治轉變的一幕。事後，李氏對於這次維新派的失敗，改革沒有成功，是因為一般人失於激烈，過於急進。他曾勸告從事改革政治運動的人，須用和緩方法開導守舊派，并啓迪皇太后，而後纔可以成功的。他又論列戊戌政變的事，寫信寄給住在香港的一位中國朋友說：

「論現在救中國的問題，我是盡力所能，但滿人仍喜黑暗，阻擋光的照。也不肯聘請實心愛中國的西人，作他們的助手。再是有些中國大僚，過於守舊，還印刷書籍，造謠毀謗西來的善士。而他們心中所期望的西學西法，是海陸軍的戰術，鎗砲的製造。想用西法，抵抗西人，時有排外的思想，要把外人逐出中國。若是抱存這種相爭不和的野心，所以上帝不願將保民的權柄，常交託在他們手中。因為這種思想，實是破壞中國的思想。無論是中國，是列國，若不維持和平，想用武力強權，為政治根本，未有不失敗者。但願中國在改革時期，要和睦人民，不外常常講求如何和睦，中外以誠實相交。這樣，那一切幸福，必然相因繼續的而來了。凡係當國的，若以利益為先，公義為後，不問你的國如何大，如何強，沒有能恆久不敗的。」

從李的這番話看來，絃外之音，非常宛轉的慨乎言之，李氏不滿於清曾和官僚的守舊頑固劣根性，已見一斑。

梁啓超的「變法新議」第三節「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有說：

「恫乎英士李提摩太之言也。曰：西官之為中國謀者，實以保護本國之權利耳。余於光緒十年回英，默念華人博習西學之期，必已不遠。因擬謁見英法德等國學部大臣，請示振興新學之道，以備異日傳播中華之用。迨至某國，（丹按：這次李

氏回英，曾順到法德兩國，此似是指遊德而說。投刺晉謁其學部大臣，叩問某校新規，并請給一文憑（護照），俾遊遍全國大書院（大學）。大臣因問余考察新學之意。余實對曰：欲以傳諸大中華也。語未竟，大臣艴然變色曰：汝教華人盡明西學，其如我國何？其如我與各國何？文憑遂不可得。

這是反映維新運動與李氏的宣傳，都有密切聯繫。

戊戌政變失敗，北京市上，發生流血慘劇，即謂「六君子」殉難。康有爲事先得了載灃的密旨，倉皇的祕密出京。康乘輪南下到達吳淞轉香港以後，即連續寫了四封信寄給李氏，追述這次事變失敗的癥結及經過真相，并託李氏在京就近代爲收拾殉難志士的遺骸。摘錄第一封信，以見一斑。

康有爲致李提摩太函 李提摩太先生閣下：四日一別，並言敝國宮廷之變。僕是日受皇上密詔，令設法求救，而貴公使不在，事無及矣。五日，卽有大變，致我聖明英武力變新法之皇上被廢，並聞旋卽弑矣。嗚呼痛哉！僕臨朝太后，淫昏貪毒，守舊愚蠢，乃敢篡位，幽弑，自稱訓政。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安有臨政二十四年天子，英明變法如此，而待訓政者哉？我國經義帝者以嫡母爲母，不以庶母爲母。僕太后在同治則爲生母，在今上則爲先帝一遺妾耳。豈可以一淫昏之宮妾，而廢聖明之天子哉？淫后毒死我顯后，酖死我毅后，憂怒而死我穆宗，今又廢弑我皇上，真神人所共憤，天地所不容者也。向來阻抑新政，及鐵路三千萬海軍三萬萬，皆提爲修頤和園，昭信股票，則起天津行宮，致國弱民窮，皆由於此。將來以國託與別鄰，則不爲敵國之憂，亦地球大局所關也。僕身經十死，荷蒙貴國保護，得全性命，俾傳密詔，伏乞轉求貴公使電達貴政府，主持正義，保我皇上聖躬，全我皇上權力，施我大德，感且不朽。我皇上必將有格外圖報，以扶亞東大局，抑貴國實利賴焉。謹爲我在貴公使前謝，保護之德，謹代我大皇帝求救，惟垂哀察，名另具。

戊戌後二十六年，康有爲題跋「戊戌與李提摩太書」有說：「……李提摩太君，英教士之仁者也，與吾交久，吾薦之上，

將令在懋勤殿行走，以政變未成。李君以電救吾於總領事白利南。白君未之言。自總領既救我，相見於兵艦。……及甲寅歸國來滬，李君開會歡迎，吾演說大同。……亡友程伯葭（清）收藏康給李的信，對於李之營救康出險經過，更有詳細的敘述，如云：「光緒丁戊之間，余佐英人李提摩太君辦上海廣學會。七月二十四日，李君與余航海北行，月杪至京，寓英公使署，適英使避暑外出。翌晨，乃遷至米市施醫院。八月三日午後，康先生來言，新政施行甚難，吾頃奉諭旨辦上海官報，明日將南下矣。吾欲乞友邦進忠告，而貴邦公使又不在京，至可惜也。李曰：竟不能調和兩宮乎？康曰：上行新政，盈廷叡謬，諸臣恐被罷黜，哭訴太后、太后果信之，致橫生阻力，夫復調和之可言。六日午後，梁啟超偕徐君仁鏡來，兩人抱頭而哭。李曰：哭胡爲者！宜速謀補救之策。余曰：究竟現在情形若何？梁曰：垂簾之詔已頒，有廷寄與沿江海督撫，務獲康先生而甘心焉。譚復生等亦已不入內，無所謂新政矣。倉皇間拭淚而別。忽容純甫（閔）來函，言政府緹騎四出，梁氏甚危，能爲之地否？李曰：梁固知趨避者，毋煩余爲畫策也。作答書竟，負手倚門立，有頃，以淡巴菰一枝賄余，而自吸其一。與余對面坐於短榻上，謂余曰：西人之覬國者，皆言貴邦政治已入正軌，循序以進，不難富且強，不圖有此挫折。余曰：全國風氣不開，諸頑固黨羣附太后，欲革新政治，豈易易者。雖然，康先生恐不免矣。李曰：在海舶中，當無恙，到上海則甚危險矣。余曰：上海貴邦總領事白理南君，非吾廣學會會長乎？李曰：然，但能否盡力，不可知耳。余曰：萬國皆保護政治犯，先生盍發一電以救之？李不語，久之，曰：電可發，恐無補耳，且不知所附何船。若在華法界登陸，則敗矣。余曰：亦惟盡心焉耳已。李領首者再，凡數易稿，乃授余曰：知此事者，惟吾兩人，宜深祕之。余雖無憚於貴邦政府，惟在貴邦多交際，則亦不得不爾。余且諾，且攜稿外出發電而回。英領事白君得電，請示於倫敦政府。英首相沙士勃雷，俟覆電允許，乃派工部局員濮蘭德乘兵艦至吳淞，得康先生於重慶輪船，乘風破浪，直抵香港，是爲康先生出險之始。……」

這兩段話，真是珍貴史料，李與康梁們的維新派的密切往來事實，赤裸裸表露了。

後來，李氏因年老由華回英休養，第一次歐戰結束，梁啓超游英舍館剛定，謝絕一切酬應，即往拜訪李氏。梁對人說：『到英後，有多人邀請宴會演說，但我先訪李老博士的寓所，想來早會因博士爲吾人維新運動的一位良導師也。』由此看來，李提摩太與康梁們的戊戌政變關係怎樣，更可瞭然了。

李提摩太，一八四五年生於英國南威爾斯省法爾的布里尼村。畢業哈弗西浸禮會的神學院。一八七零年到上海，歷在山東、山西、北京等地傳教。其在華工作較有成績的，一爲主持廣學會的譯述工作，一爲辦理山西大學堂。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病歿於倫敦，享年七十四歲。

吳佩孚與楊忻

執起筆來，想略寫楊雲史的生平，便聯想到吳佩孚（字子玉）來，因為楊與吳二人有特別關係，於是就一同談談吧。我們評述吳氏，先要知道他的歷史，圓田一龜的「新中國人物誌」裏對他的標題：「山東之第一武人——俊傑吳佩孚」，吳在失敗後日人對他的軍功已推崇備至，書中所敍事實，如云：

「吳佩孚在山東武人中，乃唯一之俊傑，以聲威煊赫，聞於天下之直隸派總帥也。毀譽褒貶，雖隨其勢力之消長而來，其爲中原之偉大人物，固未能否認也。山東之武人雖多，但真有武人之典範如彼者，初不多覩。王占元、靳雲鵬、張懷芝等，本係老前輩，但終不能與吳佩孚相比較。盧永祥、孫傳芳之徒，雖有多少酷似之點，仍不足同日而語。單就彼於山東武人中，蔚然露其頭角之處，在現代中國之軍人界覓之，實無其匹……吳佩孚本爲秀才，投筆從戎，入清末名將嚴士成麾下；因義和團事件，嚴氏故後，乃受段祺瑞之薰陶，學於保定武備學堂，時靳雲鵬、李成霖皆其教官。後充張敬亮之部下，意見不合，乃藉靳雲鵬之推薦，轉於曹錕部下任營長，時當曹錕之第三鎮在長春。辛亥革命，隨曹錕入關，破山西革命軍於娘子關，其後守備京畿，駐防北京南苑。三年陞第三師炮兵第三團團長。二次革命之際，沿京漢線南下，從事於湖南方面之攻略，駐防岳州。三年，經第三師副官長，進任第三師第六旅旅長，時曹錕爲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從之。四年冬，唐繼堯、蔡鍔等反對袁世凱之帝制，以雲南軍出四川，吳佩孚隨曹錕入川討伐。五年，袁死後，歸來駐防保定，曹錕爲直隸督軍時，進任第三師之代理師長，張勳擁溥儀復辟之戰，以兵進北京，與段祺瑞軍取共同行動，當時有一無名之師長，乃吳佩孚之雌伏時代也。彼之存在，得人確認。乃自民國七年夏，以第三師長，在張懷芝之下，任援粵副司令，

且爲直隸軍前敵總司令，出動於湖南方面爲始。其行軍時，連戰皆捷，恢復岳州、長沙，略衡陽而據之，與南軍對峙時，即其得意之初也。當時北方乃段祺瑞一派之天下，湖南督軍之位置，不與第一殊勳之吳佩孚，而任命張敬堯。因安徽派跋扈過甚，吳佩孚憤而與南軍妥協，放棄衡州，率兵北上，更與奉天派提攜，一舉而大破之。由此遂成以曹錕爲首領之直隸派之基礎。自此以後，直至第二次奉直戰爭止，據洛陽古都，策畫直隸軍閥之武力統一，先逐湖北之王占元，以心腹之蕭耀南代之，自任兩湖巡閱使，又兼直魯豫巡閱副使。十一月四日，藉名山東問題，反對奉天派卵翼下之梁士詒內閣，遂誘發奉直之戰，驅逐張作霖於關外。使孫傳芳、周蔭人攻取福建，援助楊森經營四川，而割據其一部，以大直隸主義而造成其黃金時代。

「曹錕登大總統之大位後，遂自任直魯豫巡閱使，爲直隸派實際上之主將。第二次奉直之戰，與奉天軍戰於山海關，自立陣頭，勇戰奮鬥，頗占優勢。但馮玉祥一派之反戈，斷絕後路，遂陷於全軍覆沒之悲境。結果，乃由天津浮海，溯長江，而入湖北黃州。雖一度還至洛陽，不能安居，乃入雞公山，最後移岳州，度決川艦之水上生活者，一年有餘。十四年冬，與奉天軍提攜，乃由岳州出漢口，宣布討赤，就任討賊聯軍總司令，恢復河南，進兵直隸，驅逐馮玉祥，系之國民軍於南口。十五年六月，與張作霖會於北京，大有重演鴻門宴之概。南口尙未陷落，而南方之蔣介石北伐軍，以破竹之勢，席捲湖南，而逼武漢。吳佩孚倉皇南下迎戰，但時機既逸，遂一敗塗地，不能復振，天地雖大，幾無彼立身之地矣。……」
讀此吳的發跡和他的人生所走的途徑，也可以得着一個輪廓了。

金梁的「瓜圃述異」，把吳與齊白石（璜）、賽金花（趙靈飛）列入「燕山三怪」，說：「故都人海形形色色，無奇不有，而畸人異客，傳者尤多。近世風日下，高逸之士，已不可睹，僅流俗所稱三數人耳。述燕山三怪。」關於吳的有云：

「吳蓬萊一秀才，初窮困，賣卜京師。京中多山東館，皆魯籍，重鄉誼，憐而衣食之，至今猶傳述吳將軍軼事，引以爲榮。吳

後遊遼瀋，依曹四，四長測量局。其兄曹三，以標統駐東省，一日發要電，囑四起草，四輒委之吳。稿上，三大賞之，用爲司書，食兵餉月數金耳。吳敢爲大言，遇事輒饑舌，三素稱能容人，喜其直。數年，擢爲軍佐，嘗忤其營長，怒而言諸，三請正法。三竟拔吳代其職。吳大感激，遂以身許三，永勿負。及丁巳復辟，三擬電賀，以稿示吳。吳適大醉，漫置之，竟失去。三索稿，無以應，輒含糊答曰：『事將敗矣，何賀爲？』乃竟事敗。三驚異以爲料事如神，信任愈專，軍事遂一切委之矣。三既正位，左右多媚佞，吳嘗欲入清君側，謂將烹兔宴客，自喻如姜維之請斬黃皓也。直奉之戰，吳將大舉出關，連車運軍械，鐵軌擁塞，數日不能直達，軍皆苦飢，而吳豪飲如故，謂指顧搗黃龍耳。不意爲人所乘，竟覆全軍，又自喻如昭烈之連營遇火也。吳每值大挫折，輒談笑自若，從不灰心；常言拿破倫字典無難字，我一生無悔字，其倔強故自可喜也。惜自負過甚，不免信口而談，實累盛名云。』

文裏所說曹四是指曹銳，曹三則指曹鋗。至說吳的從軍，與「新中國人物誌」略有不同。「烹兔宴客」，是指曹鋗嬖人李彥青之流而說，「近代名人軼聞」也有述到吳的軼事，摘錄三則如下：

「吳佩孚幼時，其母呼之曰：『阿虎。』居蓬萊本籍，時科舉未廢，垂髫入塾，吟哦旦夕，師固一村學究也。吳性頑皮，不喜句讀，塾在東村，往還六七里，苦師之督責綦嚴，乃時匿於荒崗下，偕隣兒若干人，拋磚爲戲，師屢微之，仍不改其行。告其母，母泣訓之靡效。斯夕，不進食，吳詢知其故，哭訴悔之。母迺令其妹伴往，始稍問讀。一日，師書一虎字，曰：『此汝名也。』且解之。虎伏山，毛作斑黃色。越日詰之，吳瞠目不能答。再問之，曰：『是我名也。』言次，躊躇不知音義。師怒，施以夏楚，吳哭而歸。母慰之曰：『虎字虎能撲人，汝切記之。』其後師又詰之，吳沈思有頃，忽作撲狀，投師仆於地，卒以此退學。吳以是忿愧交併，每大言曰：『我終不負虎字也！』其後吳果與虎成爲緣，而狴犴萬千，一如猛虎出山，生氣虎虎，信有佳譏也。」

「子玉在職時，見客輒談笑揮霍，旁若無人。凡部屬進見，多恭聽議論，唯否無抗顏者，膽怯者至俯首不敢仰視，識者咸謂其驕。顧吳於此亦有佳處，每接見外人時，亦多以滑稽之論調，相酬時，有嬉笑怒罵之風。駐洛陽時，有外商某，以皮革爲業，投刺求見，爲招徠軍裝之介。吳辭之不可，遂延見。坐定後，寒喧甫畢，革商乃爲歌功頌德詞，絮絮不已。吳忽詢之曰：『貴國以牛羊爲食，亦知貴國人所食之牛，從何處來乎？』革商瞠目不能對。吳笑曰：『君不知乎，蓋吾國昔有老子，騎青牛西出函谷關，直赴西方。貴國人所食之牛，卽老子青牛遺種也。』言畢，拊掌大笑。革商惘然辭出。吳笑謂其幕府曰：『昔李少荃（鴻章）常以接見外人爲消遣，吾今日特效之耳。』幕府某卽曰：『大帥可謂目無全牛矣。』吳得意而笑。

「第三次直奉戰後，子玉乘決川艦寄泊岳陽樓，兵柄雖除，物望猶存，會屆誕辰，各方代表藉名祝嘏，商吳就聯軍總帥之職。吳方入座，宴客適鄂督蕭耀南壽屏寄到，中有『蓬萊此去無多路』之句，蓋意存諷諫。吳掀髯微笑，卽席於原句下，綴以『從此蕭郎是路人』，電覆於蕭，針鋒相對，頗稱風趣。」

以上所引說的，都是吳在軍事上的陞遷和二三軼事而已。至吳晚年蟄伏北方的景情如何，關係他的一生名節更大。吳於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北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大公報香港版在六日的社評有說：

「近十年來，氏雖伏處北平，究未忘情國事，蓋其剛勁之性，自負之心，初不能盡祛其政治的野心。惟以向來治學駁雜而不純，好談迷信，又於現代政治，少所認識，是以雖居恆倣岸自負，而實際去現世甚遠，不足語於學者通人或政治領袖之列。」

這些話，確是批評極公允。吳的頭腦陳腐，不讀新書，對於有新思想的人才，也不肯羅致，尤其是他本人於現代政治經濟，全屬門外漢。而頻年作戰，無非是瀆武亂紀，以爲靠用武力，本着一股慾氣，便可以統一全國，造成一二人的獨裁，英雄迷